

論新加坡新聲詩社舊體詩詞中“中國意識”的轉變 ——以 1957-1985 年端午“詩人節雅集”為例

張玉

論 文 摘 要

舊體詩詞創作與“詩人節”紀念屈原的活動，兩者皆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。本文以 1957 年成立的新加坡新聲詩社為研究對象，以紀念屈原的端午“詩人節”雅集為切入點，探討舊體詩詞作品中“中國意識”的轉變與“本土意識”的呈現問題。新聲詩社成立於新加坡自治前夕、逐漸成長於新加坡獨立之後，隨著國家意識的不斷強化，烙有傳統印記的“詩人節雅集”作品，從對“南洋風物”的書寫、到自我身份的“雙重肯定”、再到對本地生活及文教事業的關注，都展露出詩人的“中國意識”逐漸發生明顯的轉變，其表現形式也變得豐富多樣。究其轉變原因則與詩人身份變化、新加坡社會本土意識不斷增強有著密切的關聯。

關鍵詞：端午雅集 新聲詩社 國家意識 本土意識

張玉 (Zhang Yu)，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，研究方向為二十世紀香港“南來詩人”舊體詩詞研究。 Email: zhangyusuzhou@gmail.com

前言

學界對於馬新文學中舊體詩研究的關注不多，而舊體詩卻是研究馬新華文文學的起點。李慶年《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（1881-1941）》一書指出，1881年12月《叻報》創刊，正式掀開馬新舊文學的序幕。¹新加坡舊體詩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無法切割的關聯，1949年以後新加坡華僑雖然在政治上被切斷了與中國的聯系，但以南來文人為主的新加坡舊體詩壇卻未因此而凋敝，其創作中仍帶有強烈的“僑民意識”或“中國意識”。無論新文學或舊體詩，“地方色彩、本地意識和僑民意識（中國意識）的角力顯然是這場歷史劇的主軸”，²它們的發展都呈現一個“逐漸脫離中國文學，構建本土文學傳統，融入新加坡本土文化發展的進程”³的態勢。林立《流寓與本土意識：新加坡華文舊體詩中的南洋色彩》一文將新加坡舊體詩的發展分為：早期“過客和流寓者”的舊體詩創作，以邱菽園為代表的新加坡詩人，儘管他們仍視中國為祖國，但作品中早已流露“雙鄉意識”；新加坡建國後，以潘受、張濟川為代表的新國民詩人，其“本土意識”更為濃烈，但作品中仍表現出“強烈的中華屬性”。⁴如此梳理使得新加坡舊體詩的發展脈絡更為清晰，本文據此選取《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》（1957）、《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》（1958）、《新聲詩社辛丑端陽雅集丹絨禺特刊》（1961）等特輯，1957-1983年《南洋商報》刊載的詩人節雅集作品為研究對象，從“詩人節”緣起與新聲詩社成立入手，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南來詩人創作的影響，從早期詩人節到新加坡建國前後詩人節雅集作品中“中國意識”書寫轉變與“本土意識”呈現之現象進行分析，嘗試還原詩社作品逐漸由濃厚的“中國意識”向多元的“本土意識”之過渡，以及詩人身份認同的確認。

一、“詩人節”緣起與中國傳統

首以端午節作為“詩人節”紀念愛國詩人屈原，最早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由

本文獲得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“馬來西亞新加坡漢詩資料整理與研究學術計劃”資助部份經費。

¹ 李慶年：《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，頁3。

² 黃錦樹：《境外中文，另類租借，現代性：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》，收入《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：辛亥前後的文人、文學、文化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2012，頁172。

³ 趙穎：《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研究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15，頁197。

⁴ 林立：《流寓與本土意識：新加坡華文舊體詩中的南洋色彩》，《東方文化》2015年第1期，頁73。

郭沫若⁵、老舍、臧雲遠等人代表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（“文協”）所提出。“文協”於1941年召開第一屆“詩人節”大會，郭沫若、老舍、于右任皆有演講，會上朗誦屈原《離騷》、即興賦詩，並將每年農曆五月五日端午節訂為詩人節，⁶最後發表名為《詩人節緣起》的宣言，⁷宣稱：“目前是體驗屈原精神最適切的時代。”⁸倡導屈原的愛國精神對抗戰具有積極的宣傳意義，“詩人節”至少連續辦了兩屆，後因國民黨政府的反共高潮，詩人們各自分散，“詩人節”也因此中斷，偶爾只在一些文人圈子裏進行。

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，並沒有恢復慶祝“詩人節”，而“臺灣詩人卻年年歡度詩人節”。⁹此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。首先，“詩人節”在四十年代曾引起非常激烈的爭論，焦點圍繞在屈原的“愛國詩人”身份與端午節是否為了紀念屈原的歷史問題。¹⁰這些爭論的背後是當時國、共政治力量的競爭與此消彼長，兩黨的文人代表皆利用屈原形象與傳統文化來宣揚各自的政治主張，著重於對自己有利的宣傳。感懷屈原詩歌中“忠信見逐”以及對昏庸統治者的指責，兩黨於1949年前後對“詩人節”的態度顯然不同。對共產黨而言，端午節與屈原所代表的傳統的“舊文化”，在新中國成立後已不宜再提倡，尤其屈原的作品代表了對時代的不滿；而流寓臺灣的一些詩人適可借此樹立傳統文化的“正統”形象，如于右任（1879-1964）在1955年臺南詩人節大會上發表演說，“贊揚了三百年來臺灣的詩社、詩風”，並闡述要紀念屈原的原因，“一是紀念其作品的偉大，一是紀念其人格的崇高”，提倡詩人要有“知死不可讓，願勿愛兮”的殉道精神。¹¹于右任幾次在臺灣詩人節大會的講話中都隱隱流露一種以“屈原放逐”自比的意味，而這種意味也是1949年以後臺灣“詩人節”紀念活動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。

曾經參加1941年“詩人節”大會的易君左（1899-1972），其於1956年出版的《華僑詩話》中記述臺灣詩人節大會的盛況，提到此次大會中有不少海外僑胞詩人紛紛響應，在香港的詩人節慶祝活動也有“外籍詩友的漸漸合流”，而旅菲（律賓）華僑詩人中也有關於詩人節的歌詠。¹²從《華僑詩話》所述，可知易君左與東南亞華僑詩人的往來酬唱十分頻繁，而1957年在新加坡首次的詩人節雅集

⁵ 郭沫若於抗日戰爭時期創作了大型歷史劇《屈原》，借屈原的故事諷喻當時的政局。

⁶ 常久：《“詩人節”的由來》，《新文學史料》1979年第3期，頁39。

⁷ 泯：《第一屆詩人節》，《新文學史料》2002年第2期，頁61。

⁸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：《1941年“文協”刊出的詩人節緣起》，《重慶師範學院學報》1982年第2期，頁17。

⁹ 霍松林：《詩人節與于右任在臺灣詩人節大會上的演說》，《中華詩詞》2011年第8期，頁62-63。

¹⁰ 王家康：《四十年代的詩人節及其爭論》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2003年第1期，頁1-20。

¹¹ 霍松林：《詩人節與于右任在臺灣詩人節大會上的演說》，頁62-63。

¹² 易君左：《華僑詩話》，香港：著者（出版社？），1956，頁13-16。

的出現，正是響應易君左等人對“詩人節”的提倡與推廣。

二、早期新聲詩社“詩人節雅集”與“中國意識”

1. “詩人節”與新聲詩社

新聲詩社以“詩人節”為契機，成立於1957年雙林寺的端午節雅集。此是新加坡首次大規模的以“詩人節”為名的雅集，與會詩人卅餘位，包括當時頗有詩名的謝雲聲（1900-1967）、葉秋濤（1906-1973）等。雅集中公議籌組新加坡“新社”，推舉葉秋濤、謝雲聲、林志高、倪啟紳等起草章程，邀請華社著名領袖李俊承（1888-1966）為領導者。謝雲聲稱：

本日雅集，為紀念詩人屈原憂時愛國自我犧牲的精神及寓有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的意旨，同文之間，除文章熏陶外，還有道義的輔助，此後希望逢有良辰佳節，擬再繼續舉行，借以振作文風，而挽風雅。¹³

可見“新社”最初成立的目的有三：一、紀念愛國詩人屈原；二、以文會友；三、振作文風，發揚傳統。其於屈原評價則稱“憂時愛國，行吟澤畔，作自我犧牲的消極詩人”¹⁴，此與于右任所謂的殉道精神一脈相承。1957年的新加坡正值自治前夕，各族人民可通過法律程序登記為新加坡公民，從英殖民地政府手中獲得較多的權益，這也為舊體詩人依法申請成立詩社提供“以文會友”的條件。而在振作文風方面，部份詩人以“遺民”自居，提出“華風遠播，海國增光”的理想，也有詩人只是單純希望繼承“傷心詠嘆，慷慨激昂，伸紙揮毫，陳辭遣句，述往事，追來者，以遂其誌之思”的抒情傳統。¹⁵

據《南洋商報》載，“新社”成立之初並非順利，從1957年公議籌組“新社”，到1958年改名“新聲詩社”並推舉籌備委員，再到召開發起人大會、進行申請註冊，直至1959年4月才正式獲准註冊，歷時近兩年。¹⁶在此期間，除了

¹³ 謝雲聲等：《新加坡丁酉詩人節雅集會贈言》，《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》，新加坡：新聲詩社，1957，頁3。

¹⁴ 謝雲聲等：《新加坡丁酉詩人節雅集會贈言》，《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》，頁3。

¹⁵ 林素允：《戊戌詩人節雅集紀盛》；洪來儀：《詩人節賦》；林志高：《愛國詩人屈原》，《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》，新加坡：新聲詩社，1958，頁6、4、2。

¹⁶ 新加坡《南洋商報》1958年6月23日、7月21日、8月18日、1959年4月4日分別有《端陽節詩人雅集大會籌組“新社”改稱“新聲詩社”並推舉籌備委員多人》、《新聲詩社舉行首次籌委會通過要案多宗訂下月中召開發起人大會》、《新聲詩社章程草案通過進行申請註冊》與《新聲詩社註冊獲准》的報道。

1957年雙林寺雅集，1958年詩人節雅集有四十八人參加，包括來自香港、印尼詩人，出版《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》收錄詩詞作品一百零一首，詩歌體裁豐富多樣。1960年“庚子詩人節”，新聲詩社參與南洋大學中文系第一屆畢業典禮的“雲南園雅集”，中文系教授劉太希（1898-1989）也參與其盛。1961年“辛丑詩人節”，新聲詩社與南洋大學師生在陳六使的丹絨禺寓所舉行雅集，出版《新聲詩社辛丑端陽雅集丹絨禺特刊》，收錄詩詞作品一百七十三首，無論在題材、體裁或創作水平，都達到早期“詩人節”雅集的一個高峰。

根據筆者所得全部有關新聲詩社的詩人節雅集資料，新聲詩社大規模的“詩人節雅集”活動，或於1962-1970年間中斷了九年之久。社員方煥輝（1922-？）《有餘書屋吟草》中說，他寫於1971年“辛亥詩人節雅集”的《端午新聲詩社雅集賦呈社長陳寶書》詩自注云：“壬寅（1962）中秋、重九、癸卯上元、花朝，幾度唱酬，轉眼十年於茲矣。”¹⁷ 陳寶書（1900-1984）《留星室吟草》中有《庚戌詩人節前一日雅集鳳凰樓》一詩，¹⁸ 經考證應作於1970年端陽前一日；馬宗薌《吟香詩集》中也有一首《詩人節前一日譙集感賦》，¹⁹ 雖未標明創作時間，用韻卻與陳寶書《庚戌詩人節》一詩完全相同。其他社員作品集和報章資料中亦不見相關報道和詩作。筆者推測，陳寶書、馬宗薌等或於1970年舉行小型詩人雅集並作此詩，並非公開的雅集活動，如此則與方煥輝詩自注所言相符，新聲詩社此前大規模的詩人節雅集確是中斷了，直至1971年6月4日《南洋商報》報道的“辛亥詩人節雅集”，才又延續此前的傳統活動。

由於中斷時間較長，參與雅集的詩人也出現較大的變動，故本文將“詩人節雅集”分為早期（1957-1961）和後期（1971-1985）兩個時段。具體資料如下：

表一：新聲詩社1957-1985年“詩人節雅集”及作品資料表

時期	序號	年份	名稱	參與詩人	作品
早期	1	1957	丁酉詩人節雅集	李俊承、謝雲聲、葉秋濤等三十三人	詩48首
	2	1958	戊戌詩人節雅集	李俊承、曾心影、蔡寰青等四十八人	詩詞共101首 （詞2首）

¹⁷ 方煥輝：《有餘書屋吟草》，新加坡：嘯濤篆刻書畫會，1999，頁5。

¹⁸ 陳寶書：《留星室吟草》，新加坡：（？），（？年），（頁？）。

¹⁹ 馬宗薌：《吟香詩集》，新加坡：（？），（？年），（頁？）。

	3	1960	庚子詩人節雅集	劉太希、黎國昌，謝雲聲、李俊承、曾心影等三十二人	詩 38 首，刊於《南洋商報》
	4	1961	辛丑詩人節雅集	新聲詩社成員四十餘人與南大師生十餘人，共五十二人	詩詞作品共計 173 首
	1962-1970		詩人節雅集中斷（？）		
後期	5	1971	辛亥詩人節雅集	黃昫吾、潘受、陳寶書、方煥輝、謝夢齡等四十餘人	方煥輝、陳寶書詩各 1 首 ²⁰
	6	1977 年	丁巳詩人節雅集	陳寶書、馬宗薌、張濟川等十八人	詩詞賦共計 29 首（篇）
	7	1979	己未詩人節雅集	陳寶書、林炳文、馬宗薌等二十人	詩詞共 36 首
	8	1983	癸亥詩人節雅集	陳寶書、歐陽澄、謝夢齡等十六人	詩詞共 60 首
	9	1984	甲子詩人節雅集	馬宗薌、張濟川、許乃炎等十人	詩詞共 27 首
	10	1985	新粵乙丑詩人節雅集	新聲詩社、中國廣州詩社	詩詞約 170 首

以上所列十次的詩人節雅集，均為新聲詩社有報章報道或出版資料記載的、公開的、頗具規模的詩人節雅集。

2. 早期“詩人節雅集”作品中的“中國意識”

1957 年“詩人節雅集”作品全部收錄於《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》一書，²¹ 體裁為五律和七律，題材也較簡單明確，大致分為歌詠屈原和紀念雅集盛況兩種。在這樣的題材下，詩人往往流露“客居”的感受，如李俊承詩云：

佳節庚酬唱，天南第一聲。只憐為客久，無意以詩鳴。吊古懷先哲，
匡時仗後生。等閒觀世變，宜醉不宜醒。²²

²⁰ 《南洋商報》1971 年 6 月 4 日刊載《本邦詩人盛事：新聲詩社舉行雅集榜鵝酒家吟哦賦詩》的報道，但未刊任何作品。方煥輝《有餘書屋吟草》中有《端午新聲詩社雅集賦呈社長陳寶書先生》一首、陳寶書《留星室吟草》中有《辛亥端午節後一日新聲詩社雅集丹絨禺水榭》一首，當作於 1971 年此次詩人節雅集。

²¹ 新聲詩社早期“詩人節雅集”詩歌均為同題作品，如 1957 年雅集作品全部以“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”為題，1958 年全部以“戊戌詩人節雅集”為題，1961 年全部以“辛丑端陽新聲詩社雅集丹絨禺”為題。至 1979 年己未詩人節雅集，各人作品始各有題目。

²² 李俊承詩，詳見《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》，頁 7。

其中“宜醉不宜醒”句，延續屈原《漁父》“舉世皆濁我獨清，眾人皆醉我獨醒”²³之意，表達詩人高潔的特質。香港詩人黎耀楣“滾滾汨羅水，哀哀楚客心。懷才遭世嫉，報國藉屍鍼”，也以“楚客”表達相同的“客居”感受；倪啟紳“最憐身在炎荒外，吊古三湘負卻心”，更抒發流離失所之感。²⁴

早在二十年代已於新加坡舊體詩壇頗享盛名的葉秋濤，其詩的客居之感則沒有這麼強烈，其云：

雙林禪院聚吟朋，午日堂堂紀屈平。綠水青山潛正氣，美人芳草起詩情。道親只覺身難遇，言淡依然意易傾。我自瓣香欣一掬，欲從新社聽新聲。

詩中引用屈原“香草美人”的標誌性意象與“瓣香”典故，秉承舊體詩的創作傳統，“道親只覺身難遇”則表達他鄉遇知音的難能可貴之感，同時透露詩人冀望詩社建立舊體詩社交網絡的意願。林忠傳“海外騷壇嘆寂寥，非關吾輩喜狂驕。胡周新體曾行世，絕律舊詩不合潮”詩句，表達舊體詩因受白話文和新文學的排斥而知音難覓的感慨，詩末“際此百花爭蕊放，好邀騷客把魂招”，則與葉秋濤一樣冀望借助詩社雅集以“聽新聲”的願望。²⁵

曾心影（1903-1988），在新聲詩社“戊戌詩人節雅集”（1958）之際被推選為新聲詩社第一任社長。²⁶其詩云：

周南窈窕楚人風，惜頌離騷百代宗。漢水煙波朝暮外，巫山雲雨有無中。靈修不悟孤臣白，芳草多情夕照紅。眾醉憐君醒太苦，招魂詩節九州同。

第一聯的“楚人風”、“百代宗”是指詩歌傳統，第二聯的“漢水”、“巫山”則將意境寄託千里之外的故國，“靈修”、“芳草”代指君王和自己，“醒太苦”、“九州同”則是自我情感的抒發。此詩借歌詠屈原以抒發自己的故國之思，帶有明顯的“客居”色彩和強烈的“中國意識”。與之相似，同是南來詩人的同濟醫院醫師曾志遠，其詩云：“檻外斜暉照石榴，聯吟此日憶神州。湘江潮咽千年恨，獅島魂招

²³ [宋]朱熹：《楚辭集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，頁113。

²⁴ 黎耀楣、倪啟紳詩，詳見《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》，頁7、12。

²⁵ 以上葉秋濤、林忠傳詩，詳見《丁酉詩人節雙林寺雅集特刊》，頁8、16。

²⁶ 曾心影，福建惠安人，新馬兩地知名報人和作家，戰後《南洋商報》主筆。（柯木林：《世界福建名人錄·新加坡篇》，新加坡：福建會館，2012，頁276）

萬古愁。”在這類詩作中，經常可見“神州”、“九州”、“國”字眼的出現，大都指向中國，並用“客”字點出詩人的流寓心態。²⁷

另有將思鄉與“思國”相結合之作，如楊文昭詩云：

是醒是醉兩惺惺，湘水依然颯楚風。艾酒何妨迎午節，龍舟空自吊孤忠。羈愁怕入思鄉夢，壯志難消報國衷。偏有詩人閒不過，悲吟爭與付雕蟲。²⁸

劉太希於1960年“庚子詩人節雅集”發表的一首七律，故國之思尤顯，詩云：

南瀛午節萃詞雄，置酒高臺望郢中。百劫山河供鬥蟻，八紘霾霧聽吟龍。勞勞海表投荒意，惻惻湘累去國衷。日晦已無天可問，元音期振楚騷風。²⁹

由於早期雅集的參與者基本都是南來詩人，無論是“投荒意”或“去國衷”，在他們詩作中對故國的關注始終未曾間斷。

在早期四次的“詩人節雅集”中，1961年辛丑雅集在參與者人數、詩作的數量、體裁與題材方面，都達到高峰狀態，此固因前三次雅集的積澱，也因南洋大學師生的參與。南洋大學是一所由東南亞華人捐建、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大學，正式成立於1955年；生物系黎國昌教授是最早與新聲詩社往來的南大詩人，參與了1958年戊戌雅集。1960年3月，南大舉辦第一屆畢業典禮，邀請新馬詩界名流在雲南園舉行雅集，新聲詩社的謝雲聲、曾心影、葉秋濤、許乃炎、陳寶書等廿餘位詩人參加雅集，全部詩作收錄於《雲南園吟唱集》。1961年辛丑詩人節，新聲詩社成員與南大師生在陳六使的丹絨禺寓所雅集，出版《辛丑端陽雅集丹絨禺特刊》；謝雲聲致辭中以“炎荒地燠，草樹恒春。南國風淳，人物信美”³⁰開端，“信美”二字見於王粲《登樓賦》“雖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”。³¹此語或有一定的客居之感，但對南洋風物也表達了讚賞之情。

綜觀1961年辛丑雅集題材，已不再局限於歌詠屈原與雅集盛況，出現了以時事入詩、描寫本地生活與南洋風物之作，如洪來儀的“園裏香浮椰結子，林端

²⁷ 曾心影、曾志遠詩，詳見《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》，頁8-9。

²⁸ 楊文昭詩，詳見《戊戌詩人節雅集紀念刊》，頁12。

²⁹ 劉太虛詩，詳見《庚子詩人節雅集》，《南洋商報》1960年7月3日。

³⁰ 謝雲聲：《辛丑端陽新聲詩社雅集丹絨禺特刊》，新加坡：新聲詩社，1962，頁1。

³¹ [南朝梁]蕭統、[唐]李善注：《文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，頁490。

秀挺竹生孫”，但“單純描寫南洋色彩並不即等於具有本土意識，作者怎樣看待自己的去留才是關鍵”。³² 關於詩人的自身去留與身份認同，曾志遠七律詩云：

星門天險已成空，三島煙雲一夢中。獨立橋邊芳草路，丹絨海畔落花風。
去來千里潮相似，聚散十年人不同。最是隔江春望好，萬峰青到水樓東。³³

詩中“去來千里潮相似，聚散十年人不同”句，似是詩人對自我身份的反思：千里外的“潮水”與此處有何不同呢？而幾十年來詩人的生活已發生了變化。

由於早期新聲詩社社員以南來文人為主，雖然辛丑詩人節雅集詩作中出現關於南洋風物和本地生活的書寫，但整體上並未呈現明顯的“本土意識”，而由“客居”引發的“故國之思”卻從未中斷，且帶有強烈的“中國意識”。這種情況在相隔十年後的詩人節雅集，詩作中的“本土意識”則開始發生轉變。

三、“中國意識”的轉變與“本土意識”的呈現

自1970年陳寶書擔任社長以來，詩社逐漸恢復運作，開啟社課活動。社課活動每月一次，由社員或詩友輪流命題。據《南洋商報》載，1972年第17期社課以“杜鵑”為題，詩人既可以“南洋遍地皆有”的杜鵑花為題，也可以中國傳統詩歌中的“子規”鳥為意象。³⁴ 其中一些詩作仍然流露強烈的故鄉意識，如蔡映澄《杜鵑》詩：“叫月聲隨斷續風，曉看啼血染花紅。閒情猶復催歸去，未解慈闈竟已空。”以“杜鵑啼血”的典故抒發對故鄉親人已不在的悲痛。劉楚材“客愁無那況清明，月色空山百緒縈。忽聽不如歸去也，何人不起故鄉情”，仍然表達“不如歸去”的思鄉之情；林忠傳“無端風雨送春歸，花事闌珊日日稀。忽聞子規啼不斷，庭前徒倚吊芳菲”，其與傳統詩歌“傷春”一脈相承的情感，顯然來自一種對故國的想象。³⁵ 此類“傷春”之作在《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》（1981）中比比皆是，而其社課選題一直兼有南洋風物（詠樹膠、榴槤、星洲十二景等）與故國之思（詠梅花、感時、詠史等）等。

³² 林立：《流寓與本土意識：新加坡華文舊體詩中的南洋色彩》，《東方文化》2015年第1期，頁103

³³ 曾志遠詩，詳見《辛丑端陽新聲詩社雅集丹絨禺特刊》，頁15。

³⁴ 詳見《新聲詩社闡述杜鵑社課經過》，《南洋商報》1972年6月26日。

³⁵ 蔡映澄、劉楚材、林忠傳詩，詳見《新加坡新聲詩社百期社課選輯》，新加坡：新聲詩社，1981，頁53、99、116。

在 1971 年以後的雅集詩作中，出現一些與此前不同的主題。首先，在一些詩作中出現對自我身份認同的“雙重肯定”，這與此前詩人的“客居”之感明顯不同，例如 1977 年丁巳雅集的林柏麟作品，云：

佳節端陽角黍香，猶傳漢俗在殊鄉。南洲有幸杯同把，湘水無情恨獨長。濟濟騷人欣雅集，鏗鏘鉢韻賴宣揚。高歌一曲行雲過，三日餘音尚繞梁。

詩中雖稱“殊鄉”，但本地已為詩人的又一“鄉”，在故鄉和“殊鄉”之間，詩人的感受是“南洲有幸”而“湘水無情”，顯然更加認同本地生活。再看看此次雅集中許乃炎的诗作，云：

屈子如今已不沉，無需澤畔續行吟。離憂消盡餘風雅，四海為家愜素心。³⁶

在詩人眼中，如今已無需再“行吟”，“四海”皆可“為家”，這種對自我“雙重身份”的肯定與同時期潘受、張濟川詩的“雙鄉意識”十分相似。

其次，後期的詩人節雅集詩作中流露出對在地生活與社會方面的關注。如許乃炎於 1983 年癸亥雅集詩云：“小店租營十八年，今朝被迫鬧搬遷。幾經挫折襟猶闊，歷盡崎嶇骨更堅。”³⁷ 此詩主題顯然已與詩人雅集沒有直接關聯，而是抒寫詩人的在地生活感受。方煥輝詩則寄寓其對本地華文教育的擔憂，云：

風雅誰從海外尋，且憑艾酒豁胸襟。湘江渺渺空餘恨，郢曲悠悠孰會心。競渡已忘投黍意，朗吟如聽繞梁音。獨憐域外猶三楚，未辨縱橫速禍深。

隨著新加坡華文教育衰微，詩人擔憂華人將逐漸忘卻“投黍意”，而舊體詩也將如其他傳統文化一起被丟棄。馬宗薌《八聲甘州・己未端陽前三日韓江酒樓雅集倚聲賀社慶兼吊屈原大夫》一詞，則將詩社傳統看作振興本地文教的一種方式，而稱“南國吟風盛，華族之光”，下片又云：

共仰靈均忠藎，失意離故國，哀郢沉湘。恰當端午近，誰不憶湘江。

³⁶ 林柏麟、許乃炎詩，詳見《新聲詩社丁巳端陽雅集詩詞輯》，新加坡：新聲詩社，1977，頁 5-7。

³⁷ 許乃炎詩，詳見《新聲詩社癸亥端陽節詩詞輯》，新加坡：新聲詩社，1983，頁 8。

喜今朝，苔岑咸集，慶典中，憑吊未嘗忘。都深解，重詩人節，社譽彌彰。³⁸

相比“失意離故國”的屈原，詩人此時“喜今朝，苔岑（詩友）咸集”，冀望通過詩人節雅集與其他詩社活動，弘揚華人文化傳統，振興本地華文文教，使得“社譽彌彰”。方煥輝與馬宗薌的一詩一詞都作於1979年己未雅集，此時新加坡華校與華教同時在走下坡路，南洋大學最終也於1980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，並採用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。

關於“中國意識”（早期亦稱“僑民意識”）與“本土意識”的界定，黃錦樹闡述為“前者指向自身文化、宗族、肉身的根源”，後者則“直指現實的存在（關切在地的社會、政治議題）”。³⁹上述詩人對在地生活感受與本地文教的關注，正是黃錦樹所指的“本土意識”的表現，可見在此類詩作中，傳統的“中國意識”已在轉變，而較為明顯的是“在地意識”或“本土意識”的呈現。

再次，後期的詩人節雅集詩作，從“國粹”到“漢粹”或“唐粹”的措辭轉變，也是“中國意識”淡化的表現。在早期的雅集，詩人常用“國粹”代表舊體詩詞或傳統文化，而在1983年癸亥雅集，李金全則稱“揚漢粹，賴諸公”；出生於印尼的華僑詩人林雲峰則云：“盟誓繼將吟嘯舉，力揚唐粹化南邦。”⁴⁰由此可見，社員中除了早期的南來詩人，也有一些新、馬和印尼出生的華僑詩人，而他們的詩作中不再出現“國粹”字眼，較多使用“漢粹”的說法。

最後，當1985年詩人節雅集有了廣州詩社的參與，面對從中國到來的“客人”，新聲詩社的詩人們則完成對自我身份的認同，在詩詞中以主人姿態向中國詩人介紹新加坡名勝，其中以馬宗薌《臨江仙·步楊應彬先生韻》最為典型：

先生遠遊期未定，原非吉日先涓。一朝承約到南天，準時機降落，旅客湧如泉。島國樹林真茂盛，四周滿布綠園。裝潢恰似美青年。料騷人賞罷，心緒感怡然。

與此同時，與“中國意識”的轉變形成強烈的對比，南來詩人張濟川詩中已開始展露一種全球視角與“博愛”情懷，云：

³⁸ 方煥輝、馬宗薌詩詞，詳見《新聲詩社慶祝廿二周年紀念暨己未詩人節雅集詩詞特輯》，新加坡：新聲詩社，1979，頁13、10。

³⁹ 黃錦樹，《境外中文，另類租借，現代性：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》，頁172。

⁴⁰ 李金全、林雲峰詩，詳見《新聲詩社癸亥端陽節詩詞輯》，頁5、10。

兩岸春花一樣紅，寰球勿復計西東。美蘇賀歲天同戴，東越流民道未通。非亞炎情猶待拯，中東霸氣妄爭雄。人間擾攘何時了，爭奈升平總落空。⁴¹

“勿復計西東”是對“本土意識”的一種更深層次的升華。在同時期的社課活動中，雖然帶有“中國意識”的詩作仍佔一定的比重，但整體上“本土意識”或“在地意識”的呈現，也比早期的詩人節雅集作品更為明顯了。

結語

舊體詩的創作需要詩人在題材、意象、歷史典故和語言等方面，都對中國古典詩歌有一定的掌握，因而從事舊體詩創作的詩人，其與中國或中國文化的關係更難割開。本文所述“中國意識”的轉變，是相對於新加坡在地“本土意識”的呈現，“詩人節”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密切，因此早期的新聲詩社端午雅集作品表現出強烈的“中國意識”，雖於1961年辛丑雅集中也有對“南洋風物”的書寫，但仍未呈現明顯的“本土情懷”。相隔十餘年後，詩人節雅集作品開始出現詩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“雙重肯定”，對本地生活及文教事業的關注，並表達了詩社應該承擔振興本地華文文教的願望，旨於通過詩社的社會作用以推動個人的身份認同。這種“中國意識”的轉變，一方面是社員構成的變化，從早期以南來詩人為主導，後期則包括已成為新加坡公民的“南來文人”，以及在新、馬和印尼出生的詩人；另一方面，自新加坡建國以來，官方不斷強調的“國家意識”也影響了詩人們的創作意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兩種意識之間並不是絕對的“此消彼長”，詩作中流露的情感與詩人的個人感受是密不可分，詩人們看待問題的視角也不盡相同，並非完全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轉變。新聲詩社的一些詩人，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中始終流露強烈的“中國意識”，到了八九十年代的社課中，其“中國意識”的表現形式也變得豐富多樣，有關心中國時事、故鄉時令之作，也兼有題詠南洋風物和故鄉風物之作。隨著新加坡華文文教式微，“中國意識”的轉變或“消滅”，則與新聲詩社成立之初的五六十年代作品，形成頗為鮮明的對照。

⁴¹ 馬宗薌、張濟川詩詞，詳見《中國廣州詩社、新加坡新聲詩社乙丑年文化交流詩詞合輯》，新加坡：新聲詩社，1985，頁31、25。